

中国十五至十八世纪图书馆学思想论要

况 能 富

明清两代(亦即明中叶至清中叶),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经验科学内容大发展乃至成熟的重要时期。明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元王朝不到百年的统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明中叶嘉靖年间开始不断滋长,虽途中曾一度遭到抑制,但至清中叶乾隆年间,已逐渐获得较大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的进步,新的社会思潮也不断涌现;活字和整版印刷技术,亦从明中叶起盛行于世,官私刻家之众,刻本之多,内容之繁,实属空前。因此,国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得以大发展;同时,出现了一大批图书馆学研究者,产生了一大批图书馆学论著。笔者拟从这一时期人们的图书馆学认识的三个逻辑发展阶段,试论其主要著作的图书馆学思想。

一、邱濬《论图籍之储》

第一阶段。自明宣宗朱瞻基(在位1426—1435)在《司经局箴》中提出“国有储副,天下之本”,邱濬(1420—1495)在《论图籍之储》中提出整治国家图书馆为治国平天下之首要的思想及其全部内容,又有胡应麟(1551—1602)《经籍会通》对图书馆学领域进行了源流、类别、遗轶和见闻四项研讨;至焦竑(1540—1620)《修史条陈四事议》中提出图书馆“不但史学有资,而于圣世文明之化,未必无补”的意见,高濂(万历年间在世)《论藏书》提出“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邱濬及其著作作为本阶段之代表。

明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和书籍的收藏利用非常重视,只是一直整理保管不善。针对这种情况,文渊阁大学士邱濬给明朝朝廷上疏说:“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所考校,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臣恐数十年后,日渐损耗,失今不为整治,将有后时无及之悔。”^①面对明前期国家图书馆的废坠状况,邱濬把自己对图书馆的认识,于1487年前后,撰成《论图籍之储》,为《大学衍义补》之一部,陈献当朝皇帝;接着,又向皇帝进《访求遗书疏》,提出整治国家图书馆的具体意见,企图最高封建统治者端正思想,采取措施。今天,这一“论”“疏”,构成了我们将要讨论的邱濬图书馆学思想。

《大学衍义补》是作者主要的大部头著作。其内容为邱濬所认定的“治国平天下之要”^②。其目的,在于使朝廷“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诚正修齐之功。”^③关于《论图籍之储》,他在《访求遗书疏》中说,“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一书,其间条目虽多,然皆一代一时之事。惟此则万世之事,故首以此上请。”^④邱濬为什么把国家图书馆的整治,摆在其他“切要之务”^⑤之首呢?

邱濬此举,导源于对图书馆的深刻认识;而对上自三代,下迄宋明王者藏书之府发展的系统研究,是这种认识的基础。他写道:“人君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凡历几千百年,而后至于我。而我今日又有以修辑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

日而废坠放失焉？后之人推厥所繇，岂不归其咎于我之今日哉？是以圣帝明王，所以继天而子民者，任万世道之责于己，莫不以是为先务焉。”^⑥

邱濬关于图书馆的这种认识，是从图书的认识开始的。他首先认为，图书记载的内容是人类千万年认识的结晶。他说：“若夫诗、书、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具备者也。”^⑦他还把图书看成载体。他说：“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⑧这种认识是超越前人的。同时，作者比前人更明确地认识到，图书和图书馆是传递“理义”的工具。他说：“所谓书籍者，出于一人之心，名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虽同，而其所以为言者，则未必同。其间义理，著世变，纪事迹，莫不各极其至，皆可所取。一有失焉，则不可复；虽复之，亦非其真与全矣。是以古先圣王，莫不致谨于斯，以为今之所以知昔，后之所以知今者之具。”^⑨所以，“臣尝谓，天下之物，虽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宝，既失之皆可复得也。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旦无焉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关系，岂小小哉？”^⑩没有图书和图书馆，人们就象处在愚昧之中，走在黑暗无光的路上。图书馆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实在重大。他还说：“书籍之在世，犹天之有日月也。天无日月，天之道废矣。世无书籍，人之事泯矣。”^⑪此言，足见作者所识之深，所论之精。

关于图书馆的内容，邱濬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在分析前汉“藏书之始末”后，他评论说：“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由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⑫邱濬用清晰的文字，将图书馆一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集中表述出来，这是人类图书馆学知识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基于对图书馆的认识和图书馆内容的理解，邱濬还提出“整治”明代国家图书馆的意见。

首先，邱濬提出增设国家图书馆或分馆。他说：“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而“今天下书籍，尽归内府。”他建议将“副余之本，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如此，则一书有数本，藏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⑬

其次，他提出充实图书馆藏书。一是“将秘阁所藏，已成编卷者，逐一校对无差，雕印颁行。”^⑭一是向“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与几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搜集抄录内府所缺之书。^⑮

其三，他提出“严加校正”藏书。他要求“馆阁职清务简，不预他务。宜委之校仇刊正，俾于每卷之末，署其名衔，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⑯

其四，他提出加强藏书借阅手续。他说：“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违者治以违制之罪”，“不许监官擅自开匱，取书观阅，并转与人。”^⑰

其五，他认为，“宋有馆阁之职，以司经籍图书。今制不设馆阁，并其职于翰林院。夫无专官，则无专任。”他提出增设图书馆官员。“如此，则葺理有官，而编简不至于脱误；考校有人，而文义不至于讹舛；考阅有时，而载籍不至于散亡矣。”^⑱

埋没达五百年之久的邱濬图书馆学论著及其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是人类图书馆学认识发展中的无比珍贵的思想资料。邱濬的图书馆学思想是我国经验图书馆学进入成熟时期的起点。

二、祁承煜、孙庆增图书馆“整理说”

第二阶段。明末清初，是处在末期的封建社会关系剧烈变动的年代。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尤其是反对程朱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想和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潮，给社会思想界以强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社会帷幕中，私家藏书的突出发展和图书馆学著述的繁荣，更丰富了整个社会思想的内容。

祁承煜(1563—1628)《澹生堂藏书约》、《庚申整书小记》的图书馆“整理论”，及华淑《贮书小谱》的小经验，接着曹溶(1613—1685)提出以钱谦益为鉴，呼吁“流通”中经钱谦益(1582—1664)的保藏整理思想，黄宗羲(1610—1695)的藏书读书思想，徐秉义(1633—1711)《内府藏书记》由“书者，载道之器，治法之所以出也”的认识，提出藏书患“杂”患“伪”，强调“不惟其多而惟其精”的论点。至孙庆增(清初人)《藏书纪要》再现图书馆“整理说”。这就是本阶段的逻辑过程，其中以祁承煜和孙庆增的著作为代表。

作为私人藏书家，祁承煜和孙庆增同南宋郑樵一样，采集图书，整理、考阅自己的藏书，几十年专心致志，辛勤不懈，故所著皆自己长期累积的切身体验；他们或“令儿辈朝夕观省”^①或“同志欲标其要”^②，故所论皆细腻精详，包含许多真知灼见。

作为私人藏书家，很明显，他们的藏书都是私产，为自己所利用的。孙庆增藏书目的是做学问，他说：“圣贤之道，非此不能考证。”^③祁承煜则在于教养子弟。他说：“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斯余藏书之意乎。”^④当然他们“读书”目的是“不为小人”^⑤，而永做“贵人”的。因此，他们经营各自藏书，皆以整理为务，故他们所记载或阐述的经验也莫出于此理。所以图书的购求与鉴别，藏书的校勘与分编就成了当时经验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

关于图书的购求与鉴别的内容，祁承煜与孙庆增亦同亦异，但祁氏比孙氏更详细。

祁承煜提出购书的三项原则。他说：“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⑥所谓“眼界欲宽”，是指购书时对图书的视野开阔一些，不要“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览，便恐妨正业，视为怪物”，也不要“稍窃窥目前书一、二种，便自命博雅，沾沾自喜，不知宇宙大矣。”^⑦克服这种“习俗溺人，为毒滋甚”^⑧，方知“旷然宇宙，自有大观”^⑨，才能购求精当之书。所谓“精神欲注”，讲的是购书须聚精会神，持之以恒。他认为，“古今绝世之技，专门之业，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⑩。否则也难购求所需之书。所谓“心思欲巧”，是说购求时，应该千方百计地购自己所需之书。他十分推崇郑樵的求书八道，他说：“一巧以用八求”^⑪。他还提出“散帙勤收，如绝流之不遗涓滴”^⑫；“遗书之难遇，残阙必收”，“鼠蠹并采”^⑬；“异本方来，即片笺之之宝”^⑭，“补缀而成鹤结之衣”^⑮。还说及“以吾所余，易人所有”^⑯。这些购书之法，既全面又具体，实在是可贵的经验之谈。孙庆增提出购书六难之说，也是一般私人藏书家的苦衷。

至于鉴别，孙庆增说：“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⑰。祁承煜认为“藏书之要，在识鉴”^⑱。两人都十分重视。孙氏认为，对所购之书，其版源流，“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然后四方之善本秘本，或可致也”^⑲。其次“须看其版之古今，纸之新旧好歹，卷数之全与缺，不可轻率”^⑳。他尤其注意“辨别真伪”，对“鉴别宋刻本”，“永乐间所刻之书”，“外国所刻之书”^㉑，一一详列自己的经验。祁氏把自己的认识，概括为五条。他说：“识鉴所用者，在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如此而已。”^㉒所谓“审轻重”，是掂量图书的学术价值，版本的贵贱。“辨真伪”，是要求辨别伪书。“核名实”，是认真检验图书的

内容与名称是否相符。“权缓急”，是根据“业为世用”^④的原则，权衡确定某些书可急买，某些则可暂缓。“别品类”实为分类之内容，但作者认为“博询大方，参考同异，使井井不谬于前人”，^⑤列入鉴书内容之一，也未尝不可。祁氏内容比孙氏内容宽一些。

关于藏书的校仇，两人所论，无甚新见，在分类编目上，倒是有许多新奇的创造。祁承焯对分类编目的意义和作用，认识比较深。他指出：“架扞七层，籍分四部，若卒旅漫野而什伍井然，如剑戟摩霄而旌旗不乱”^⑥，讲到了分类于排架的作用。他又说：“目以类分，类由部统，暗中摸索，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取观，若执镜而照物”^⑦。他已看到分类的检索作用了。孙庆增对此亦有认识。他说：“善于编目者”，须“不致错混颠倒，遗漏草率，检阅清楚，门类分晰，有条有理。”^⑧

鉴于上述认识，祁承焯对以往的分类之法进行种种分析研究。他认为，历代分类“条贯灿然，始末毕具，莫精于马氏之一书”^⑨。于是他以《文献通考·经籍考》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为基础，又“取陆文裕流品之论，存其梗概”^⑩，即借鉴明代陆深《江东藏书目录》之破四部法体系，创立自己的“因四部之定例”，“益四部之本所无”^⑪之新体系。对此，后人给予高度评价，蒋元卿先生说：“其体例之善在明代可称佳作。”^⑫姚名达曾说，“统观有明一代中”，“分类之研究，比较肯用心思，有所发明者，允推祁承焯为冠军”。^⑬

不仅如此，祁承焯还提出：“通”与“互”的编目理论。他说：“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⑭。“承焯所论，有古人未发者两端。其所谓通，即后来章学诚所谓别裁，其所谓互，即学诚所谓互者；欲使分类恰当，非善用此法不可。此古人所不识，石破天惊，允推承焯为分类学之一大发明家。”^⑮姚名达对祁氏“通”与“互”的论定，颇为恰当。

孙庆增认为“藏书四库，编目最难。非明经典籍者，不能为之。”^⑯于是，他概括提出：“大凡收藏家编书目有四则”，这“四则”实际是编四种目录及其目的与方法。“一编大总目录”，似孙氏藏书总目。“二编宋元刻本钞本目录”，似孙氏“特藏”目录。所藏宋之本为“不借本”“另贮一柜”，“不许擅开”。“三编分类书柜目录”，“以便检查而易取阅”，似“读者目录”。“四编书房架上书籍目录及未定之书，在外装订之书，钞补批阅之书，各另立一目。候有可入收藏者，即归入柜，”^⑰似“公务”目录。目录的著录也十分精详。如书名，卷帙，著者朝代，作者的著作方式，何时何版本，校者，册数，套数等等。做为私人藏书，目录组织如此程度，可见藏书整理、管理之精，藏书寻检、利用之勤。

祁承焯和孙庆增关于图书馆学的“整理学说”，是我国经验图书馆学的成熟思想，所以，得到了后继者的充分肯定。缪荃孙认为，祁氏“约简而明，足以藏书者法。”^⑱他又说，孙氏“所记皆甘苦之言，益人见识不少。”^⑲黄丕烈则说：“此《藏书纪要》，言之甚详且备，盖亦真知笃好者。”^⑳关于祁承焯的图书馆学思想，钱亚新先生指出：它“不啻是祁氏对我国图书馆学一套理论和实践的先驱。”钱先生还认为，祁氏的论著对曹溶、丁雄飞、孙庆增和章学诚及其著作都产生过深刻影响。^㉑至于孙氏之作，谭卓垣指出：“此书向为收藏家们所谨守不渝，直至今日对现代的中国图书馆犹具有影响。编辑珍本书目时用的许多术语皆出自该书，更不谈鉴别宋、元版本的规范之胥以此书为圭臬了。”^㉒这就是说，孙氏此书所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已具有近现代图书馆的品格了。谭卓垣的评论是言中实质的。

三、弘历、周永年公共图书馆思想

十八世纪，即康熙(1662—1722)中，经雍正(1723—1735)，到乾隆(1736—1795)年间，清朝的民族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日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日益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活动的加剧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日盛，使当时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同时，书籍的出版达到新的高峰，使图书馆也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因此，我国的图书馆学思想出现了新的飞跃。这就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由丁雄飞提出借钞质证书籍，至清代中期出现弘历(1711—1799)、周永年(1730—1791)的公共图书馆思想及其实践，此后阮元(1764—1849)推广此意而辟“书藏”，津逮后学。弘历、周永年的思想为本阶段之代表。

弘历作为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建造“七阁”，贮“钦定”《四库全书》，以“嘉惠士林”，其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研究和评论他对图书馆的深刻认识和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弘历是怎样认识图书馆呢？

他认为，“儒与道，匪文莫阐”^④。关于“文”的作用，他说：“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⑤因而，他指出：“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⑥。弘历还认为，图书是传播文化于世间的载体。他说：“夫岂铅槧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槧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由亟亟也。”^⑦弘历进一步指出：“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匱石室之藏，将以嘉惠士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⑧这就是弘历建“七阁”的理论依据，也是他的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发端。

基于这种认识，弘历下令“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鉅也”^⑨。又“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藪”，建文汇、文宗、文澜三阁，此“藏书之所”，“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菁绿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⑩

关于江南“三阁”，弘历“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稽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箱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⑪他谕示各地，“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⑫要求对民间士林即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放。

不久，弘历又发布谕示，重申：“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富有美备，不特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⑬“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该处为人文渊藪，嗜奇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有珍秘，以阻争先快睹之忧，则所颁三分全书，亦谨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⑭这当然是旨在传播封建文化思想的。

除江南三阁，翰林院也开放了。弘历谕示：“至文渊阁等，禁地森严，士子等固不便进内钞阅，但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如有情殷诵习者，亦许其就近钞录，掌院不得勒阻留难。”^⑮

弘历认为：“如此广为传播，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见之书，至为钞录，传之日久，使石渠天禄之藏，无不家絃户诵，益昭右文稽古，加惠士子盛事，不亦善乎？”^⑯至此，弘历的公共图书馆思想，已充分表达了。后来，郑观应说，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江南三阁，“淮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⑰李端棻也说，弘历“特于江南”设“三阁”，“备度秘籍，恣人借观。”^⑱事实证明，江南三阁及翰林院的藏书，已经对普通人士开放。

同时，周永年也认识到书籍的含义和它的社会作用。他说：“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⑲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看到“流传”“藏书”的图书馆之于启迪人智的功能和缺少藏书之弊。他说：“天下都会所聚簪缨之族，后生资禀苟少出于众，闻见必不甚固陋，以犹有流传储藏之书故也。至于穷乡僻壤，寒门寒士，往往负超群之姿，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⑳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自汉以来”，“官私之

藏”，“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①

怎么办呢？周永年想到，“明候官曹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只惜“曹氏虽倡此议，采撷未就。”^②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周永年“有感于斯言”，决心勇挑创建“儒藏”之重担。在《儒藏说》中，他宣称：“今不揣谫劣，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③同时，他高兴地指出：“儒藏之成，可以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果使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而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其才之成也，岂不事半而功倍哉？”^④为此目的，周永年树起了“儒藏”的旗帜。他执着地坚信：“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人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⑤这种公共“儒藏”思想，驱使着周永年以“愚公移山”计，为之奋斗。

他或“连年奔赴四方”，或投信鼓动于师友，竭力寻求响应和支持。据近人杨家骆说：“周永年乃更著说，以论儒藏之要，士大夫起而和之者颇多。”^⑥周永年深知首建“儒藏”之艰，提出“儒藏不可旦夕而成，先有一变通之法”，^⑦即采取若干措施：有志此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于一家之藏”；互相传抄书目，“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刊印秘本，“彼此可以互补其所未备”。^⑧他认为，“如此则数十年之间，奇文秘籍，渐次流通。”根据这种分析，周永年进一步提出广置“儒藏”的大胆设想。他说：“始也积少而为多，继由半以窥全。力不论其厚薄，书不拘于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一县之长官可劝一县共为之，一方之巨族可率一方共为之。”^⑨因此，他甚至抨击那些迷信鬼神的人说：“今愚夫愚妇不惜出金钱以起祠宇，较之此事，轻重缓急，必有能办之者。”^⑩

周永年的倡议和实践，都是成功的。据史载：周永年“以为释、道有藏，儒者全无。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⑪周永年提出了前人未曾表述的思想，解决了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他同弘历一道，在十八世纪，把中国图书馆学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 * *

十五—十八世纪，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繁荣时期。在这四百年里，从明代中叶邱濬全面提出整治国家图书馆的思想，中经祁氏孙氏的“整理说”和曹氏丁氏的“流通说”，至清代中叶弘历、周永年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产生，这是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螺旋”。这些封建时代的图书馆学论著，在指出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同时，对其中反映的图书馆学思想，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给以科学的总结。

从两宋伊始，迄于清中叶，中国图书馆学的经验科学内容，走过了七百余年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历程。自此，清廷腐败日盛，对抗进步、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日趋猖狂，中国图书馆逐步衰败，图书馆学思想也渐渐沉寂，开始落于欧美之后，这是十九世纪的事情了。

注释：

①④⑤⑬⑭⑮⑰ 邱濬：《访求遗书疏》。

②③ 邱濬：《大学衍义补·序》。

⑥⑦⑧⑨⑩⑪⑫⑯⑱ 邱濬：《论图籍之储》。

⑲⑳ 祁承埭：《澹生堂藏书约·序》。

㉑㉒ 孙庆增：《藏书纪要·序》。

㉓ 祁承埭：《澹生堂藏书约·读书训序》。

㉔㉕㉖㉗㉘㉙ 祁承埭：《澹生堂藏书约·购书》。

- ③①③②③④⑤④ 祁承煜：《庚申整书小记》。
- ⑤⑦③③ 孙庆增：《藏书纪要·鉴别》。
- ⑤④④④④④⑦ 祁承煜：《澹生堂藏书约·整书》。
- ⑤③④ 孙庆增：《藏书纪要·编目》。
- ④⑤⑥ 祁承煜：《庚申整书小记·庚申整书略例》。
- ④⑨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第95页，中华书局1937年5月上海版。
- ⑤①⑤②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129、133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月上海版。
- ⑤⑤ 缪荃孙：《澹生堂藏书约·跋》。
- ⑤⑥ 缪荃孙：《藏书纪要·跋》。
- ⑤⑦ 黄丕烈：《藏书纪要·跋》。
- ⑤⑧ 钱亚新：《祁承煜——我国图书馆学的先驱者》，《图书馆》1962年第1期。
- ⑤⑨ 谭卓垣：《清代图书馆发展史》，转引自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藏书纪要〉出版说明》。
- ⑥⑩ 弘历：《文渊阁记》。
- ⑥① 弘历：《文源阁记》。
- ⑥②③ 弘历：《文溯阁记》。
- ⑥④ 弘历：《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谕》。
- ⑥⑤⑥ 弘历：《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谕》。
- ⑥⑦⑥ 弘历：《乾隆四十九年三月谕》。
- ⑥⑧⑦①⑦② 弘历：《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谕》。
- ⑦③ 郑观应：《藏书》。
- ⑦④ 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
- ⑦⑤⑦⑦⑦⑦⑧⑧① 周永年：《儒藏说》。
- ⑦② 杨家骆：《四库大辞典》。
- ⑧③④⑤⑥ 周永年：《儒藏条约》。
- ⑧⑦ 《清史稿·儒林列传》。